

第 一 卷

第一篇 论政治算术的用处， 特别是对于考察公共收入 和贸易的用处

凡提出新问题的人，均必须说明自己赖以提出问题的基础，以使公众能较好地判断他提出新问题是还是错。

本书打算用一种特殊方式，用现今所谓的政治算术来讨论公共收入与贸易，因而也就应该先谈一谈这门学问。我必须承认，我在得出本书中的许多结论时是以政治算术作依据和指导的。

所谓政治算术，指的是运用数字对与政府有关的事情进行推理的学问。

毫无疑问，这门学问本身是很古老的；但把它应用于公共收入和贸易这些特殊对象，则始于威廉·配第爵士，迄今还很少有人步他的后尘。是配第给这门学问起了政治算术这一名称，使其具有了规则与方法；假如他能活到现在，他那出众的才智本来是会使这门学问得到更大发展的；他自始至终都是在缺乏适当材料的情况下开展工作的，而我国近来开征的各种各样的新赋税则可以向他提供适当的材料。

这门学问的基础，是充分了解人口数，配第在其全部研究中都以关税、消费税和炉灶税作为依据，但当时却并不完全公布这些账目，因而没人知道这些账目的最终数字，至少配第在写书时不知道。他力图依据我国的贸易额和消费量来计算人口数，关税和消费税帮助他估计出了贸易额和消费量，而对于计算人口数来说，炉灶税也许为他提供了更好的依据。他力图根据用于贸易的资本总额，估算我国的实力和财富；流入国库的关税和消费税，也许使他对我国的货币数量稍稍有所了解；我国的房屋数，使他算出了家庭数，据此他又试图推算出我国的居民数。

但配第的主要数字，都是在以下三方面（即消费税、炉灶税和关税这三方面。——译者）的最终正确数字完全被人知晓以前推算出来的；就消费税来说，在这种税于公元 1674 年开始包给文森特先生征收以前，包税人根据各自与政府签订的合同既无需如实公布其帐目，也无需公布其在各郡征收到的最终正确数额。至于炉灶税，在这种税于公元 1679 年包给特兰特先生征收以前，其最终总计数字也未予公布，而特兰特先生根据合同则必须公布所征收到的总数。人们只是在 1671 年以后才得到了关税方面的正确数字。

因此，配第进行推算的依据，很可能是错误的，他在许多情况下推算出的数字也就必然是不正确的；既然他当时不知道那些税收的最终正确数字，其实除了有关方面外旁人都不知道，所以他多半过高估计了它们，因此而过高估计了我国的居民数，而低估了其他国家的人口以及实力和财富。这种根本性的错误，使他犯了其他许多错误，并把那些追随他的人也引入了歧途。

的确，威廉·配第爵士非常仔细地研究过死亡统计表以及出生和殡葬报表，不仅研究过我国这方面的材料，而且还研究过其他国家这方面的材料，这无疑帮助他得出了一些很有用的见解。

然而，任何明眼人读了配第的著作，都会清楚地看出，他所要表明的看法本身并不十分正确，但却令统治者感到很欣慰。

法兰西国王力量的增强，特别是其海军力量的增强，是当时英国国会和人民很感头痛的一个问题，无疑也使国王查理二世心绪不宁。查理二世喜欢悠闲自在地生活，不喜欢有烦心的事，因而看到威廉·配第爵士的推算结果感到很高兴。根据配第的推算（见威廉·配第爵士的《政治算术》第74、75、78、85、56、57页），法国的领土只比英国大一点；人口几乎相等；我国的人口从实力上说同法国一样大；英国的人均贸易额是法国的三倍；法国的海上力量受着天然而永久的限制；法国经营对外贸易的海员人数不超过一万五千名，战时从中最多只能抽调一万名到舰队上服役。

毫无疑问，每一个善良的英国人都希望所有这些是真实的；但我们最近却得到了确凿的证据，表明这位伟大天才人物的所有上述主张都错了；由于这一原因，我们便有理由认为，他说的不是心里话，而是在讨好统治者。

配第还说，法国的力量并不那么可怕，绝不会危害大不列颠王国，理由是法国已为它违反三国协约的行为以及它所采取的所有其他有损于英国利益的措施道了歉。英国国王很喜欢听讨好的话，于是就被哄骗着进入了梦乡。

但是，假如当时从事推算的人真正比较了两国的实力，假如大臣们及时注意到法国的财富、贸易和海军力量的不断增强，以及该

国重要性的日益增大，那也许会把国王和国会从昏睡中惊醒，而不致后来使我们付出那么惨重而昂贵的代价。

任何一位大臣的才能，都一向主要表现在他的计算能力上；若不借助于数字对事物进行推理，是无法管理好战争时期与平时时期的事务的。举例来说，假设一交战国若能比敌人坚持的时间长，便会取胜 若先后退 便会战败 在这种情况下 精明的政治家难道不应该在战争一开始时就对本国和敌国的实力与财富作一番计算和比较，以加强本国的实力，把战争坚持到最后胜利吗？难道他不应该计算一下敌国的总收入，与此同时估算一下自己可以在国内筹集到的款项吗？难道这一切不会帮助他明智地管理国王的事务，并帮助他向国王提出有益而稳妥的劝告吗？一个国家可以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每年花费三百万镑而毫不受到损害，但如果在三、四年内花费两千万镑，就会被毁灭，难道情况不常常是这样吗？这就如同可以经常而少量地给人放血，但如果一下子从人体中抽过多的血，则人肯定会死。所以，伟大的政治家不仅一向设法准确地了解本国的情况，而且还设法全面了解敌国或友邦的力量和弱点；由此而作出的判断，就是政治算术。

正是凭借这种计算能力，费边·马克西姆斯 找到了打败汉尼拔^②和振兴罗马的方法。费边认为，敌军是经不起拖延的；他们的给养来自闹内乱的遥远国家；汉尼拔是个机敏狡猾的指挥官，诡

^① 费边·马克西姆斯 (Fabius Maximus, ? — 公元前 203), 罗马统帅、政治家。在第二次布匿战争 (公元前 218—前 201) 初期，采用拖延战术，为罗马争得恢复力量的喘息时间，终于对汉尼拔率领的迦太基入侵军队发动了反攻。因此，“费边主义”成了缓步前进或谨慎小心的同义语。——译者

汉尼拔 (Hannibal 公元前 247—前 183/182)，迦太基人，古代最伟大的军事统帅之一。一生与罗马共和国为敌。——译者

计多端，无法以突袭的方式打败他；他招募来的军队由各个国家的人组成，英勇善战，经常打胜仗，但若打持久战，则可以使其人员慢慢减少，从而拖垮它。相反，罗马人则是在自己的国土上，可以随时补充兵员。有鉴于此，费边彻底改变了战略。因此，他通过正确计算和比较罗马和迦太基的实力，便取得了比许多执政官和独裁官更多的胜利，这些执政官和独裁官虽然很英勇，但在治理国家方面却没有费边精明。

如果能计算出一国的实际财富和资本，如果能知道该国的财富在平时时期以何种速度增加，在战争时期以何种速度减少，那就可以知道在不损害国民利益的情况下一场战争能进行多久，以及该战争可以在什么样的基础上进行。

同样，若能正确了解敌国的情况，也可以推测出敌人能坚持多久。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命运女神不偏袒任何一方，公平地赐予其恩惠（她对于同样强大和同样富于智慧的国家通常正是这样做的）。

如果一个与其他国家结盟的国家能被正确地告知盟国的实力与财富，它就会知道它的种种考虑是否正确，是否有必要承担更大的责任，是否有必要为共同事业出更大的力。

由于以上原因，各个时代的大政治家都不惜花巨款建立大使馆，不惜花重金雇用间谍到其他国家的宫廷刺探情报，以了解敌国或盟国的真实情况。

谁想在对外事务方面掌握为本国服务的本领，谁就必须首先研究自己国家的情况；他若能充分了解自己国家的情况，也就能比较容易地了解其他国家的情况。

他必须了解本国的法律、组成情况以及风俗习惯，了解居民的人数，每年的支出及得自土地的收入，得自贸易的产品，制造业的状况以及国家的其他许多事情。由于各个地方的人大体上是一样的，因而通过确切地了解本国的情况，他也就能基本正确地推知相距不很远的其他国家的状况。

譬如，若已知英国的居民人数，那么，通过考察法国领土的面积其居民的生活方式以及其土地的状况，通过比较两国的情况并考虑到其他一些因素，就可大致推测出法国的人口。

同样，若知道英国得自贸易的收入，那么，通过细心观察荷兰人的节俭与勤劳、他们的各种商业活动、他们与之作生意的国家以及他们的货运量，就可以推测出荷兰人每年从对外贸易中能得到多少利润。

若知道一国人民能缴纳多少赋税，那么，通过考察人的不同脾性、资本与财富、领土面积、土地与贸易，通过对照比较，就可以很有把握地估计出另一国能得到多少岁入，从而大致推测出两国能把战争进行多久。

据说，破释古文字时，只要弄清三、四个词甚或几个字母的意思，其余就迎刃而解了；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所讨论的各种计算也是这样，只要能找到一个基础，在这之上展开我们的推理，就可以作出很可能是正确的推测。

无论哪一共和国或君主国，都是以人所能理解的方式强大起来的：无论哪一被毁灭的大帝国，其衰落的种子都会很早就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显露出来；需要有某种程度的智慧、美德和勇气，一国才会发展；一国只有在某种程度上做了蠢事与坏事，才会衰落。

同样，一国变富的方法也是人所能理解的，而且只要加以仔细考察，也可以很早就预见到一国财富的减少，因为只要原因清楚，就可以很容易地推测出结果。一国人民若把钱花在国内或保护自己的贸易，是会被一场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但对外战争必然会消耗一国的财富。这种财富是一国人民的共同资本，因而如果减少，该国的贸易与商业也肯定会相应减少；一国的贸易与商业减少多少，财富被输出多少，该国的财富也就会减少多少。的确，要精确地计算所有这些是很困难的，但在这一晦暗不明的领域，多少接近于真实情况的推测，却对政治家是有用的。

无疑，远离实践与经验，关起门来造车，是会把想要了解本国情况的人引入歧途的；所以，政治家若真心想增进公共福利而进行计算，就得请教各式各样的人，请教各方面的能人，而且，在这样做时，尤其要躲避投机家、谄媚者、崇拜者或门客，因为投机家满脑子都是自己的主意和盘算，作不出正确的判断，谄媚者总是唯唯诺诺，崇拜者毫无主见，而门客永远不进行争辩和反驳，真理也就无从产生了。

大政治家通过请教各式各样的人，通过全面考察本国的情况，其中包括军事力量、经济力量、贸易、财富和岁入等各方面的情况，通过弄清各方面的一些暧昧不明的地方，通过从总体上进行计算，便可以作出稳妥的判断，提出正确的意见，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政治算术。

谁具有这样的计算头脑，谁就很少会采取不当的措施，就不会在错误的基础上为国王进行战争，就不会使国王与软弱无力的国家结盟，就不会提出毫无条理而又根本无法实现的筹款计划。提

出新建议时，他会事先加以权衡，考虑会带来什么害处，会给国家的信用造成什么影响。拥有众多这样的政治家，是国家的幸运，但许多国家并不那么幸运，在这些国家，政治家的计算往往发生错误，在非常重要的事情上，在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上，政治家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犯错误。

这种计算能力不仅有利于政治家处理综合性的高级事务，而且还有助于他们履行次要的、辅助性的政府职能。不仅有助于他们管理好整个国家的力量和财富，而且如果他们知道如何正确地运用数字进行推理，他们还会在管理国家的各种税收和贸易时，很少犯错误，这一点以后再进行较详细的讨论。

几乎没有哪个国家比现在的英国更能提供帮助计算的材料。消费税是一个尺度，据此我们不仅可以推测人民的消费，而且还或多或少可以了解人口增减的情况。关税则是一个国家的脉搏，由此可窥知其兴衰。炉灶税使我们完全可以十分准确地知道家庭数，而家庭数正是上述推算的基础。这三种税收之所以是计算者的较好指南，一方面是因为它们的账目记录和保存得很好，同时也是因为它们受到了极其严格的管理，或许可以了解到它们的最终总计数字。

玛丽一世统治时期首次征收的人头税，人民都很乐于缴纳，很少有人逃税，从这些人头税账册中我们可以知道人口数目，不仅如此，这些账册还把人民分成了适当的等级和阶层，由此可知道整个王国的财富和财产。因为这些帐册以及后来征收的人头税，把纳税者分成了不同阶层、等级、地位和身份的人；由此可区分出有偿债能力的人和无偿债能力的人、接受施舍的人及其未满 16 岁的孩

子、不向教会纳税的人和穷人及其未满 16 岁的孩子、未满 16 岁的打零工的孩子、未满 16 岁的作仆人的孩子、养有四个以上未满 16 岁的孩子且家产不足 50 先令的人。这些账册所作的上述区分以及人头税的总金额，虽说免不了有遗漏之处，却极为有助于我们了解各阶层人民的情况。

玛丽一世统治时期对每英镑收入课征的 1 至 2 先令国王特享税，比任何其他时期的这种税都要征收得更加仔细，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使我们了解英国房地租的情况。

但就计算人口来说，这方面最有帮助的还是当前征收的结婚税、生育税和丧葬税；虽然有关这些捐税的报表漏洞很多，且很不完善，但格雷戈里·金先生凭借自己所掌握的政治算术知识，已改正了这些报表中的许多错误，据此而编制出了有关英国人口的统计表，非常清楚而且井井有条，也许是何其他国家的人口统计表所望尘莫及的。

上述各种捐税格雷戈里·金先生都注意到了并作了认真研究。格雷戈里·金才是政治家真正可以信赖的人，而那些挖空心思力图建立各种蹩脚基金的人，则居心叵测，总是在各位大臣的耳边传播谣言。我很想借此机会对这位擅长计算的奇才和大师表示谢意，他使我受到了许多启发，长了许多见识。

各国的财富，均产生于人民的勤奋劳作，因而想要推测国家的实力，就必须掌握正确的人口情况。

毫无疑问，正是由于这一原因，罗马人才那么经常地进行人口普查，试图以此推测出罗马共和国保卫自身或侵犯他国的力量。

而亵渎神灵的大卫^①计算以色列的人口，很可能也是出于这一原因，这似乎是又一证据，表明他拒绝神权统治，而宁愿依靠尘世的力量与人类智慧来统治国家。

无疑，无论对于哪一个统治者来说，全面了解自己所控制和支配的人力，都是非常有益处的；由此他可以知道有多少人适宜于作战，有多少人可以辛勤劳作来维持国家的生存，有多少人是懒惰无用的。

这并非像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是纯粹的空谈，相反，从中可以得出许多有用的结论，应用于实际。

如果能确切地知道人口，如果能把人口划分为适当的等级和阶层，能把富人、生活优裕的人、勉强度日的人以及穷得纳不起税的人区别开来，如果能透彻地了解所有这些情况，那么，在开征消费税或任何其他新捐税时，只要能以适宜方式征收这种税并能很好地管理这种税，就可以很精确地计算出这种税能给政府带来多少收入。

同样，就人头税来说，若能把人口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和身份，若能把有偿付能力和没有偿付能力的人正确区别开来，若能知道有多少穷人无法向教会纳税，有多少人是接受施舍的人，有多少人是流浪者，那就可以很精确地推测出人头税能带来多少收入，当然条件还是能很好、很仔细地征收这种税。

这种知识对政府是有用处的。既然什么样的税就应该带来什么样的收入，政府因此便可以监督税收，尽力让最有才干的人管理税收，以获得最大利益。这不仅适用于一定时期内的各种税收，而

① 大卫 (David, 公元前 11 世纪 一前 962) , 古以色列国第二代国王。

且也适用于期限为一年的各种基金，因为如果政府知道人头税应带来多少收入（假如能很好地管理的话），它就会努力制定出各种条例、方法和惩罚办法，来确保税款的征收。最有害于政府信誉的事，就是不能把国会所要求征收到的税款征收上来。

人口可以使我们知道国家的年收入中有多少得自土地，多少得自矿山、房屋、宅地、河流、湖泊、小溪、池塘，多少得自贸易、劳动、勤劳、技艺和科学。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如果某国拥有某一数量的可耕地，某一数量的牧场和草地，某一数量的树林和灌木林、大森林、猎园和公地、荒野、沼泽地、大山、小路、大道以及荒芜和未开垦的土地，如果通过适当的媒介计算出所有这一切的不同价值，那么便可以合情合理地推论出人民的支出中有多少得自土地……多少得自矿山、房屋……多少得自贸易、劳动……由于穷人的数量远远超过富人的数量，因而普通人便是我们可以凭借来推测出这种支出的适当媒介。

每个人在食物、衣物和其他必需品上肯定要花费一定金额；例如每年花费 7 至 8 英镑，一些人也许比这花得多些，另一些人也许比这花得少些，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作出这样的推断，即英国的普通人每年花费大约 8 英镑。由此而可以得出结论，要养活一定数量的人口，每年需要有一定数量的收入。

若土地产品未达到这一金额，则有理由认为，其余部分必然来自贸易、手工业和制造业。

而且，若一国拥有一定数量的人擅长于土地的耕作与改良，若这些人拥有一定数量的土地，若这些土地彼此具有一定价值，则由此而可以得出结论，该国的土地会带来一定数量的款项。

一定数量的土地产品可以养活一定数量的人口；经过一定程度改良的土地会生产出一定数量的产品；如果人民消费不了这些产品，就会有一定数量的产品输往其他国家。

在这种情况下，就会有一定数量的人擅长航海，精于贩运，就会把一定数量的国内产品运往许多港口，同许多国家作生意，由此而可以通过贸易获得一定数量的资本。

如果土地和贸易未达到上述支出额，则其余部分必然来自手工业、制造业和其他行业。

但如果土地及其产品连同国内生产的其他物品，足以养活国内的居民，还能输出许多农产品和制造品，且本国人拥有大量资本，能与外国人作生意，把许多货物运至外国，则我们可以推论，该国通过贸易可以获得大量财富。

所以应该把产生于土地等的支出、产生于贸易的支出以及产生于技艺和劳动等的支出区别开来。这种适当的区分肯定会成为君主和国家课征赋税的良好指南。

支出必然产生于收入；假设一国得自土地、贸易、技艺等的总收入为	} (镑) 44 000 000
假设其中得自土地的收入为	14 000 000
得自贸易的收入为	10 000 000
得自技艺和劳动等的收入为	20 000 000
	} 44 000 000

在这种情况下，课税时把几乎整个税务负担都压在这当中的两千四百万镑上，而允许另外那两千万镑不纳税，这样做合理吗？当然是不合理的。然而，若把整个税务负担都压在土地和贸易上，就必然会发生这种情况。

因此，政治算术对政府是很有用处的，因为它能把构成一国财

富的各不同组成部分区分开来。

在目前这场战争中，荷兰人把其国民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缴纳给了政府，然而，尽管该国债台高筑，荷兰的财富似乎却在逐年增加，其主要原因必然是课税时遵守了均等原则；均等的赋税会使所有的人在平等的基础上从事贸易，在平等的基础上生活。

虽说有政府的正常支出，这场战争在一段时期内每年至少还是使法国花费了一千六百万镑，这几乎等于法国每年总收入的五分之一；然而，法国却使用了非常巧妙的筹款方法，无论其海军还是陆军都从未由于缺乏适当的补给而陷于瘫痪。但是，假如法国的大臣们没有本领均等地分配税务负担的话，其政府就决不会筹集到这么一大笔款项。

假如英国非常均衡地把税务负担一视同仁地分摊给各阶层人民，那么每年筹集到五百万镑（占英国年收入或支出的八分之一），就会使战争坚持很久；均等的土地税和对全部消费课征适度的消费税，便会带来这一金额；假如当时这样做了的话，地主的处境无疑会比现在好，我们也不会负那么多债，这种巨额债务在和平到来时，必然会成为国家的沉重负担。

这种计算能力表现在能对各国的实力加以比较，能考察各国的人口、力量、政策、财富、贸易、海运、海军、陆军以及结盟等方面的情况。

不过，在这门学问中，也有庸材的用武之地，他们可以为大学问家提供有用的材料，他们只要能为大学问家提供顺手的工具也就不胜荣幸了，我就属于这类庸材。

假如有人较为仔细地研究并改进了这种综合性的计算，则很

可能会避免在税收方面犯那些错误，正是这些错误把国家搞得一团糟，大大推迟了战争的结束。

假如一些政治家请教了政治算术的话，他们就不会在国会每次开会时烦扰国会，提出那么多蹩脚的征税计划了，如新的或附加关税、按季课征的人头税、羊皮纸和报纸税、结婚税、生育税、丧葬税、玻璃器皿税、烟斗税、新的窗税、皮革税 等等 这些税反而使英国负债累累。

而且，擅长计算的人也不会错误地赞同一些人最近提议对土地课征的国王特享税和国王补贴税。所能征到的这两种税的税款，很可能只能达到原计划的大约三分之一。

为了说明对任何涉及人口的税收能作出什么样大致的推算，鄙人（虽然才刚刚开始学习政治算术）像大家所知道的那样，在 1696年 12月 24日对拟议中的国王补贴税作了一番计算。

提议课征这种税的人估计能征收到——2 105 000 英镑

而根据鄙人的计算，最多能征收到——786 000 英镑

就老百姓所谓的人丁税连同其所有附带的税（人丁税是极其复杂琐细的）来说，如果实际征收到的税款同推算能征收到的税款相差不到十万镑，那么就必须承认，政治算术这门学问确实是有真东西的，能指导人们进行计算。

毫无疑问，精通这门学问对于照管国王的收入是非常有用的；尽管不可能十分有把握地确定人口数目，尽管不可能真正知道某一商品的消费量，然而，根据某一规则（虽然无法对其进行数学上的证明）行事的人，总要比那些完全在黑暗中摸索、被奇思异想牵着鼻子走的人少犯些错误。

迄今为止，提议课征新赋税的大多数人，其计算的错误程度一般都为三分之二，所以，如果正确遵循政治算术的各项规则计算某项税收，算得的税款与实际征收到的税款相差不到七分之一或八分之一，那就应该对这门学问大加赞美。

在所有计算中，人口都是基础；不过，如果没有其他材料的帮助和指导的话，有关人口的知识只能是一不可靠的指南。计算某种赋税能带来多少收入时，必须考虑王国现在的能力与状况，现金流通情况，乃至人民纳税的意向。还必须考虑被课税商品的性质，看其是否适宜被课税，是否很容易被隐藏和运走，需要用什么样的惩罚来确保税款的征收，需要多少官吏来征税；而且还得慎重考虑宣布课征这种税的法令，因为如果有漏洞的话，就会有许多人钻空子；通过适当考虑上述所有事项以及其他一些事项，就可以合理地推断出政府课征新税能得到多少收入。

计算某种新税所能带来的收入时，当然要考虑到人口，但如果不把一国的富人和穷人适当区分开来，人口则会把计算者引入歧途，因为在大多数计算中，人们往往根据眼前所见到的，就匆忙作出推论和结论，由此而误入歧途。在这种事情上，要作出正确的估算，就得综合考察整个人口的情况，决不应根据少数人的富贵奢华来推测全体人民的富裕程度。

想计算税收的人，必须从许多前提中得出其结论；他不应依据个别事例进行推理，而应在透彻了解许许多多细节的基础上进行推理；政治算术家的组织若想提出切实可行的计划，就必须由各种各样的成员组成。

想掌握这门学问的人，必须考察政府的各种税收，必须对税收

的管理有所了解，必须熟悉各郡和各地出产什么和制造什么，必须知道我国出口哪些货物，进口哪些货物；只有对这些有了总的了解，他才能提出对政府有用的计划。思考某一件事情，也许会使他了解与此完全不同的其他事情，因为正像在通常的算术中那样，有时解一道题会附带算出另一道题；在政治算术中也是这样，各种各样的思考都是有益的，所作的各种证明可相互印证。

计算能力不仅在有关政府税收的事务方面是有用的，而且在有关贸易的事务方面也同样有用。

各国议会总是力求了解贸易的实际情况，但隐瞒真相，把有关贸易的事情搞得错综复杂，却是许许多多人的利益所在，结果，在严肃讨论贸易问题时，那些把一己私利看得比公共福利重要的人，常常把聪明人引入歧途。

几乎没有哪一商人团体不认为整个国家的繁荣仅仅依赖于他们的贸易活动。

因而向他们了解情况时，他们给予的答复总是含含糊糊，支离破碎。他们在议会作证时，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经常不说实话，歪曲真相。

无论从事哪一种贸易的人，几乎都信誓旦旦地说，国家因所有其他贸易而遭受了损失，可是显而易见，在和平时期，从整体上看，贸易却使国家受益匪浅。

真实的贸易差额状况会纠正所有这些谬误，告诉人们哪些贸易对国家是有害的，哪些贸易对国家是有益的；但也许除了依靠政治算术外，便无法弄清贸易差额状况。

而且也许只有这门学问能告诉我们，各种买卖是如何相互关

联，各种交易是如何相互依赖的。

乍看起来，那些输出货币的贸易似乎是有害的；但当我们运用数字进行推理时，却会发现，这种贸易是有益的，它们带回国的货币要多于带出国的货币。

我们与一个地方的贸易可能有逆差，但也许这种贸易会导致另一种贸易，带来双倍的利润。因此，不知道整部机器怎样运行便去阻止一个轮子的运转，是毫无意义的。

所以，要在贸易方面进行精确的计算，就得细心观察本国的财富、资本、产量、消费、海运、出口和进口等方面的情况，与此同时还得考察其他国家的情况。

在这门学问中，最难办到的，是拥有可靠的材料，具有坚实的基础，据此而展开我们的推理，因为只有当前提正确无误时，得出的结论才无懈可击。为此，上议院于 1695 年奠定了一极为坚实的基础，但愿一些精明能干之人和天才人物能对其加以改进，借此弄清人们经常谈论的贸易差额。

上议院要求关税督察官提交一份账目，列出伦敦和外港对各国的出口总额以及伦敦和外港从各国的进口总额，年份涉及 1694、1695、1696 及以后各年。要单独列出每种商品的进出口额，列出再出口时的退税额，若课征的是从价税，要列出货物的价值。卡利福德先生以其卓越才能把这一切列得井井有条。

但是，如果上议院命令以同样方式提交 1672、1673 和 1674 年的进出口账册，则会使我们更进一步了解贸易差额的情况，因为在这几年我们未参加战争，是中立国，处于有利的贸易地位，可以从一国购买货物卖给另一国，当时我们确实是在为整个世界运送货